

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学前辈

□张平

马烽老师的文学创作，是山西文学界的一座高峰，也同样是当代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霞光。马烽的很多作品，包括他的小说、影视、歌曲、弹唱，至今仍然给人们带来诸多精神的愉悦。今天我们回头翻看马烽的创作之路，以及那一辈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走向的影响，应该也是一次新的体验和回味。

像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今天的有些文学标准，似乎显得有些粗糙和生硬，但是，这部作品恰恰就是抗战时期口口相传、人人爱读的畅销小说，60多年后，这部作品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依然大受欢迎。还有像《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结婚现场会》《咱们的退伍兵》等，都曾是风靡一时的文艺作品。

马烽的这些作品，都被划归为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范畴，所以他的作品常常被戴上服务于政治的帽子，但马烽很少进行过这方面的辩解和争论。他对文学讲得最多的只有一条，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必须来源于生活，也只能来源于生活。马烽老师曾经说过，“我的创作就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群众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现实题材作品，才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共鸣和重大反响。

就像写于抗战时期的《吕梁英雄传》，在大敌当前的烽火年代，今天无论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作品也应该是那个年代最合适的作品。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特有的时代特征和政治氛围，以今天的某些标准把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一笔勾销，更不能忽略这些作品在那个特有事年代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

马烽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的观点、他的立场、他的创作始终是一致的、统一的。他是一个从精神到

言行、认知始终都合为一体的，从来没有摇摆过、倾斜过、屈从过。“文革”中，他和赵树理一样都受过批判，但他平反出来后，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从来没有过什么变化。

这一切，完全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时代命运息息相关。他出身于社会底层，成长于抗战时期，16岁入党，打过游击，当过战地通讯员，在他心目中，新中国的成立，是历史性的巨大变迁。从封建王朝及列强辱华、军阀混战、日寇侵略，一直到抗战胜利、全国解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进步和变化，也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真切感受。所以他的作品服务于他经历的那个时代，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必然，完全是一种出自于本能的自觉，不可动摇，也决不会动摇。以马老的人生经历回看马老的创作道路和文艺作品，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样的作品和这样的创作，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在生活中，马老也同样是完整的人、透亮的人。他在作协工作时，司机给我讲得最多的就是马老的为人。一提起马老，司机就赞不绝口、激动不已。他给我说了无数马老的往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马老烟瘾很大，但不下乡还是挂职，从不收受别人给他的香烟或其他礼品。即使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发现车的后备箱里有放下的香烟或什么东西，立刻要让司机连夜给送回去。这样的事情经历得太多了，司机后来也自觉了，只要有东西送东，坚决拒绝。

马老的人格还体现在他对作家的态度上。山西在“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几乎都是他和西戎、胡正几位老师一手调到作协来的。当时的晋军崛起，马老居功至伟。马老的作品和创作常常让别人说三道四，但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态势，很少有门户之见、里外之分，只是在当时有影响的、获过奖的，他都一视同仁，能调来的立刻调来，调不来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你调来。调来之后，还常常关心你的家庭情况和爱人的工作情况。这样的人格和这样的胸怀，也一样让我们肃然起敬。

人民和时代的歌者

□何吉贤

马烽是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从1940年代开始，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他的一生践行了“为人民、为生活”的道路。

马烽是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文艺工作的。1945年马烽与西戎根据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所表彰的战斗英雄的事迹，写成了《吕梁英雄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史诗性作品”。同时，它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开拓性作品。这部小说与中国小说传统具有紧密的联系。这部小说故事性强，一个大故事包罗了许多小故事，小说通俗运用白描手法，无论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很精熟、明朗。没有冗长的人物对话，环境描写都服从于人物性格的需要。因而，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小说的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独特风格。此外，这部小说的语言“练熟、平易流畅”而又诙谐幽默。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民间语言。这丰富，是自然的丰富，是从自然的丰富中又加以提炼的丰富；是由于作者出自农村，深知晓晓的丰富，而不是硬拼、硬凑，为了炫才猎奇的丰富。同时，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有明确的“读者意识”，要求自己的作品让识字者能看懂，不识字者可听懂。所有这些因素，都体现了《吕梁英雄传》作为“革命历史通俗小说”的鲜明特点。

马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人民作家。他抱定一个信念：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是一个革命的人。要坚持为革命、为人民的创作方向，深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中，挖掘题材，提炼主题，创造人物，提高创作思想与艺术水平，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马烽说，他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些作品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点了解和体会。生活本身教育了自己，感动了自己，促使自己去进行创作。1970年代末，在对自己三十年的写作进行总结时，马烽认为，1954年前后和1958年前后，是自己两个写作状态比较好的时期，主要是这两个时期和农村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半开玩笑半感叹地对我们说：“你们将来别干写作这行。写不出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写得兴奋了，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之就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父亲这句话，被当作笑料在文联大院里传了很久。

父亲是个认真的人。对待写作尤其认真。他写作有个特点，一旦构思基本完成，他就拿出稿纸，估计好字数，数出张数，然后把平时攒下的用过的牛皮纸信封拆开，给稿纸包个皮儿，用夹子夹好，像个稿纸本，这才开始动笔。我们一看到他书桌上摆着那特制的稿纸本，就知道他又在写作了。

父亲一旦投入创作，便全力以赴。1945年，他23岁，精力旺盛，和西戎合写《吕梁英雄传》，不舍昼夜。2004年，他82岁，为《吕梁英雄传》电视连续剧剧本创作，不顾劝阻地投入修改，又一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这次他竟然还吃了药，导致严重心衰，结果不治而终。他说，他和西戎以《吕梁英雄传》起家，他再次投入创作，是要对得起已经先他而去的老西。

我们小时候读父亲的作品，觉得虽然故事有头有尾很生动，人物也感人，但没啥形容词，文字也不美丽潇洒，比起人家一些漂亮文章，显得没有文采。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了谁、给谁看的问题。父亲所在的《晋西大众报》是面对基层人民群众的通俗报纸，要求文字语言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让群众能看懂，在常用的两千字内做文章。他们为此下了很多功夫，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群众爱看。《吕梁英雄传》就是在这样的写作要求中产生的。父亲和西戎根据地英雄模范的事迹，编写成故事在报纸上连载。我们听许多老人说，当年他们整天盼着投递员送来报纸，报纸一到，大家兴奋地聚在一起，听村里的小学教员读报。故事中的细节差错群众都会给报社写信指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文学修养有了很大提高，语言更加纯熟。茅盾先生评论马烽作品《我的第一个上级》，说老田这个人写得“龙拿虎跳”，还说“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最见功力”。

从抗战时期写作《吕梁英雄传》，到合作化高潮时期创作出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十多年是父亲创作的高峰期。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赢得了很高的评价。中篇小说《村仇》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多个短篇小说入选中小学课本。

父亲是山西省作协主席，对于不好写而又必须写的题材，他就主动承揽下来。1960年代初，中央交给山西两项创作任务，写大寨和刘胡兰。刘胡兰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英雄人物，牺牲时年龄尚小，写好不容易。父亲接受了任务，就去刘胡兰的家乡文水县云周西村搞调研。他估计会住较长时间，当时农民家里粮食紧张，多一张口会增加农民负担，就从家里自带了半

夏天最繁盛的时刻来到了，万物生机勃勃。这似乎是一种暗示、一种隐喻——中国的文学将迎来自己繁花似锦、百花争艳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纪念一位故人、长者、作家，意义非凡。他的一生，几乎与我们的祖国百年沧桑历程相重叠。如今，我们终于进入了新时代，迎来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这是他们那代人的夙愿、追求，是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他并不能与我们一起见证中国今天的繁荣兴盛，但我们却可以告慰他们，历史正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1922年，马烽出生。1938年，伴随着抗战的炮火，马烽参军。1940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他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吕梁英雄传》《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饲养员赵大叔》《葫芦沟今昔》《结婚现场会》，以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扑不灭的火焰》《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在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各个时期，马烽都有非常重要的作品。当他离开我们之后，他的作品仍然闪烁着动人的魅力。

马烽是最早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家之一。当时，作为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学员，马烽没有参加座谈会，却在不久之后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桥儿沟给“鲁艺”“部艺”学员的报告。报告中“不仅要到‘鲁艺’学习，更要到‘大鲁艺’学习”的论述，让他印象深刻，影响其一生。之后，他的小说《第一次侦察》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特别是与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作品与《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成为最早体现“讲话”精神的代表性作品。坚持人民性、民族性、大众化是他及那一代作家最突出的创作追求。

马烽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他青年时投笔从戎，为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奔赴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京参与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创办》，却舍弃了京城的繁华回到山西，到农村蹲点。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农村去。他是一到农村就如鱼得水的作家，是把老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的作家。他脸上的皱纹与老乡是一样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他也从不以作家自居。他

生活比较接近。“夸张一点说，就是深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之中”。1980年代初，“到处有生活”说兴起，马烽认为，到处有生活，可是并非什么生活都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文学作品的核心是创造典型人物。“深入生活”的核心就是了解人。如果作者对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不熟悉，也就谈不上什么创造典型了。他说，我还是赞成鼓励作家们“深入生活”，不过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非到工农兵中去不可。而应当根据各个人的不同情况，愿意“深入”到哪儿就去哪儿。土农工商，七十二行，对哪一行感兴趣就“深入”哪一行。熟悉哪一行，就写哪一行。从1940年代倡行走群众路线，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到1950年代返回山西，在家乡长期深入生活，深扎基层，终身不辍，马烽一生践行了“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的“人民文学”之路。

从1940年代反映和歌颂人民革命战争的英雄事迹，到1950年代书写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新农村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农民精神状态的变化，到1980年代聚焦农村和农民新的气象和精神变化，在不同的时代，马烽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他用他那通俗、幽默的笔调，用他那人那地那熟悉的马烽式的“爱抚的幽默与宽厚的幽默”，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为一位人民作家，马烽自觉要求自己，要经常注意观察了解生活中的新生物。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善于捕捉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人新事。这样才能使文艺作品更能起到鼓舞人民向前迈进的作用。他有发现新事物的敏感和比较深刻的洞察力，并善于从农村生活中撷取那些萌芽性质的新生活、新人物，写出具有教育和鼓舞作用的作品。为此，他在思想和艺术手段两方面，不断磨练和提高自己。在观念上，他认为，作品写不好问题不在于“赶任务”，主要原因还是作者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和缺乏生活所致。“任务”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从现实生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在艺术上，他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动曲折故事情节的描写，更加注意通过人物的行动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来讴歌新生活、新事物。这使得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尤其是短篇小说的表现手法日趋丰富。

作为“山药蛋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马烽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文学实践中，始终是时代和生活的积极投入者，是人民和时代的不倦的歌者。

记忆中的父亲写作片段

□马小泉 马炎炎 马小林 梦妮

口袋里。父亲经过长时间深入访问，从英雄生长的时代环境入手，完成了《刘胡兰传》的写作，在山西的《火花》月刊上连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十多年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梦妮，因拍摄刘胡兰的专题片到云周西村，采访了父亲当年搞调研时的村支书。他对梦妮说，你爸那人可好呢，在村里见了会吸烟的先递根纸烟，人们都待见他和他聊情况。从没牙的老太太到我这样跟胡兰年纪相仿的，人家都走访了个遍。写不完还让我组织村里的人，你爸念给大伙儿听，让人们写得对不对。

1978年山西省作协的文学刊物恢复了，但时光流逝，老作家们很少再动笔。父亲是他们这伙人中间的一个恢复写短篇小说的。父亲重新写小说的事，在省作协大院里传开。有赞许鼓励的，也有担心的，“若再写也超过以前，连累名声”。父亲不为所动，反而继续“捡起来”一篇，再“捡起来”一篇。他还让作家老朋友们给提意见，有时还有讨论，惹得大家也开始动笔了。父亲新写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发表，竟两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

进入晚年的父亲，完成了一个大工程，他把搁置了40年、曾经写过几个开头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重新写成了。他和我们说起这部小说搁置多年的缘由：当年他在土改工作队团部负责各工作队的情况汇总。那时他完成了《吕梁英雄传》后，创作的冲动很足。土改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产生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没想到，刚开了个头，周立波写了土改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发表了。看了人家作品好，自己的就先搁置了。现在重新捡起来，是想让后代们知道当年崞县（今原平市）土改的样子。

1978年，他56岁，重新开始写小说，到2004年他去世时的82岁，这期间，有5年到中国作协赴任，专事行政，没有动笔。其余时间，他下乡体验生活，伏案写作，竟写出了长、中、短篇小说16篇；与孙谦合作电影剧本8部，其中已拍摄并上映的4部；散文杂感计51万字。

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站在父亲的墓前，好像看到他在特制稿纸上写作的情景化成了一道墓碑，那碑上镌刻四个大字：人民作家。

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这些普普通通、在平凡中显现不平凡的形象正是中国人民觉醒、奋斗、进步的群雕。他写的是老百姓，爱的是老百姓，时刻放不下的还是老百姓。

马烽是一位热情扶持青年后进的前辈。正是在他与他老前辈作家的努力下，山西的青年创作人才不断涌现出来。这成了山西文学界最为优良的品格。他们喜欢、包容年轻人，扶持、鞭策年轻人。看到年轻人有好作品，比自己有好作品还高兴。知道谁获了奖，比自己获奖还兴奋。山西作家的精神气质中，潜移默化地生长出一些不同于他人的东西。他们有强烈的理想追求，具有突出的家国情怀，有扎实的生活底蕴，有十年磨一剑的创作苦功。

马烽也是一位律己甚严的作家、领导。他曾经放弃工资，依靠稿酬生活。他同情弱者，仗义疏财；公私分明，绝不占公家的便宜。他不留恋权位，多次要求辞去职务。为他服务的司机写申请书要求入党，他与爱人却不同意，认为没有解决好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要求司机继续提高。这位同志先后写了三次申请书才入了党。他从不摆谱装腔作势。机关院里的人都称呼马烽为“老马”。

随着时光的流逝，老马这代人先后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文学的重大损失。我们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也失去了一位长者、朋友，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位战士。每天，我们走在他们曾经来来往往的小路上，仿佛他们的音容笑貌依旧。他们的双眼还在注视着新新旧旧的每一个人。马烽和他的战友们，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空气、一种冥冥之眼、一种说不出的存在。每当无措困惑之时，常常会想到，这些老人开创的事业，我们传承得如何？我们将成为接力赛中领跑争先的选手还是丢棒落跑的逃兵？马老那位写了三次申请书才入了党的司机不善言谈。但是有一天却突然说，要爱作协啊！没有那些老人，哪有作协的今天！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八十年的延安，培养了马烽和他的战友们。今天，更多的作家涌现出来。他们一代一代地涌现，证明着中华文脉的传承永续，谱写着新时代的锦绣华章，不断地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2022年6月18日，是马烽老师诞生100周年的日子。他于2004年1月31日逝世，至今已18年，然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让我崇敬、让我终身学习的代名家、长辈。

1987年初春，中宣部为了更好地制定文艺政策，派几位有影响的老文艺家到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马烽老师是其中之一，让我随行做记录。到了天津，马烽老师采取上门看望和分别交谈的方式，到孙犁、梁斌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家里拜访，虚心听取他们对文艺创作的看法；与袁静、鲁藜、柳溪、杨润身、马骥才、蒋子龙、航鹰等作家分别交谈，诚心诚意与他们交流思想，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跟一批青年作家座谈，主要是鼓励他们积极深入生活，创作出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来。离开天津前，马烽老师专门嘱咐我，一定要按规定付给接待方住宿费、伙食费和粮票。接着，从天津去了山东、河南，两省的作家大概已经从不同渠道知道了一些马烽老师在天津的诚意，基本上没有什么疑虑，调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紧接着，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开幕，马烽老师是代表，便直接向大会报到。会议期间，马烽老师跟我认真讨论了调查报告大纲，提出了他的思路和应当有的主要内容。我写出了初稿，他作了反复修改才定稿。这次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工作，马烽老师像朋友一样，跟我谈文学，谈社会，也谈他的生活和创作体会。

有了上次一起出行的经历，我对马烽老师不再有敬畏的心理，隔一段时间，就会借一些事情，去他家里坐一坐，聊聊天。特别是1989年底，中央调马烽老师到中国作协主持工作，临走还跟我说：“从个人角度考虑，我确实不想去北京，因为五十年代初，我就在中国作协工作过七年，知道在那里当领导不容易。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又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在北京的几年间，马烽老师尽职尽责，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辛勤工作，理顺了各方关系，让中国作协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而他却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条件。我去北京出差时曾经顺便看望过他，马烽老师跟夫人段杏锦老师就住在鲁迅文学院一间十分简陋的房间里。1994年，马烽老师回到山西休养，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回忆性散文，把几十年前就曾打好提纲并写出过部分章节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和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续写、修改完。我去马烽老师家里，总是看到他在工作。

1997年冬天，马烽老师住进医院。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他说：“有不少朋友劝我把这几十年写的东西编到一块，出部文集。北京的杨桂欣已经联系好大众文艺出版社，他们愿意出。可我年老体弱，编起来有些困难，想请你帮我编，你看行不行？”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在马烽老师和段杏锦老师的指导下，先列出所有作品的目录，然后跟他们具体研究收录的篇目。在几十年的创作中，马烽老师前后与西戎、孙谦合作写过不少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起初，马烽老师不想收入这些合作性作品，以免让读者产生将别人作品据为己有的嫌疑。我认为，这些小说和剧本都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如果文集不收人，就不能全面反映他的创作成就。为了说服马烽老师，我专门查了《著作权法》，并去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咨询。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和《实施条例》，如果属于不可分割的作品，合作者都有权使用，但须征得另外作者的同意并付稿酬。于是，我与当时还健在的西戎老师、与已逝世的孙谦老师的家属，分别作了沟通，征得了他们的同意。这样，他才同意收入这部分合作作品。2000年春天，8卷本、近300万字的《马烽文集》正式出版了。这部文集，是马烽老师半个多世纪文学创作的总结，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数据。

马烽老师的文集出版后，我们计划编辑出版一套《马烽研究丛书》。起初马老不同意：“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要浪费你们的精力了。”后来，他被我们说服了，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为了写好书，我们沿着马烽老师一生走过的路，重新走访了一遍。每次回来去向他讲述所见所闻时，他总是很有兴致地听，并询问熟悉的人和事，询问老区有什么变化。特别是2003年夏天，马烽老师用了一周的时间，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披露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按我们的写作进度，2004年上半年这套丛书就能够出版。想不到的是，马烽老师还没有看到书就走了。

我与尊敬的马烽老师交往十几年，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为文的宝贵经验。他那光明正大的品格，诚实待人的态度，从不贪图名利的原则，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跟随我的每次谈话，都是对我的谆谆教诲。

马烽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发言选摘

马烽与人民作家的中介性

□贺桂梅

“中介性”这个范畴，我将其理解作为一种连接总体与局部、上与下、理论与实践乃至断裂与连续等看似二元性或多元性要素的媒介性特质。从人民文艺的实践而言，强调作家的“中介性”特点，意味着创作主体处在国家民族发展大局的总体性理念、文学实践的专业性要求、革命政党的能动性实践这三个环节的关节点上。中介性总体包含三个要素，其一是人民政治的总体性理念（即总体性），其二是作家置身先锋党组织中展开的社会文化实践（即实践性），其三是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和特点（即专业性）。作家柳青曾将这三者描述为政治、生活、艺术的“三所学校”，周立波称之为“思想、生活、形式”，丁玲则概括为“生活、创作、时代灵魂”。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彼此联系的总体，作家在这个关联体系中的能动性作用即为“中介性”。

从创作主体来看，马烽同时兼有工农兵特质与知识分子特质的中介性特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命题，包含着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工农的知识分子化这两个面向。马烽或许属于《讲话》所期许的“新型知识分子”，既是实现了知识分子化的农民作家，也是实现了工农兵化的知识分子作家。不仅是作家艺术家也是文坛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农民又有超越农民的专业性写作能力，是作家又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能上也能动，能写也能实干，是这种中介性创作主体的普遍特点。马烽的文艺创作经验和成就、思想修养和世界观，都不是在专业化的学院教育中养成的，而是在抗日战争的军旅生涯、当代中国农村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形成。可以说，马烽这一代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形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中介性创作主体。简单地称其为“土”，认为其缺少艺术深度和素养，不过是一种未加反省的专业体制内知识分子的限定性视角。如何重新理解马烽及其文学实践的特点，不仅关乎对马烽的评价，也将有助于丰富对人民文艺的理解深度和广度。

就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共和国文学的总体格局而言，马烽及其创作具有中介性特点。马烽的创作贯穿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保持了内在的连续性。当代文学在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存在着阶段性的断裂和转变，特别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转型期，对许多根据地、解放区作家的持续创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既关涉“新时期”发生时创作主题的转变，也存在着如丁玲所说的文坛格局重组的某种导向性。马烽是这一转折过程中既保持着创作活力，同时延续并推进了革命文艺创作主题的少数几位作家。同时，马烽不仅是作家，也是中国文学的组织者。特别是1990年代初他是中央中国作协的工作，保障了当代文坛又一次在平稳中转型。正是像马烽这样一批作家的存在，使得当代文学虽经历多次转折与变化，依然保持了人民文艺的某种特质和文坛组织的连续性。马烽近60年的创作，代表的是共和国文艺探索和实践的某种典范，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也以其创作的持久和坚韧更鲜明地体现出人民文艺的独特品质。

从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和个性来看，马烽的文学文本和叙事方式也体现出一种中介性特点。这具体地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叙述视角、叙事文本、人物形象、叙述语言等方面，都具有某种沟通和兼容上与下、感性与理念、新与旧、新闻与小说等特点。马烽从不将文学仅仅视为一种专业性的写作，尽管并不忽视文学创作的技艺和形式，但他始终将文学视为人民政治整体性实践中的一个有效环节。但这并不等于将文学视为理念的简单图解，而是尊重文学创作自身的艺术规律。从叙述视角和方法来看，马烽的中短篇小说大都采取了第一人称叙述，往往以一个从县里或城里下到乡村基层社会的叙述人“我”的视点，由外而内、由浅而深地呈现出人物与故事的饱满品质。这种第一人称叙述不同于个性化的自我表达与表现，而具有沟通上与下、内与外、感性与理念的中介性功能。就创作题材和其吸收转化的文学资源而言，马烽的作品侧重表现时代新人新事，但是这种“新”并不是一种观念性、外在性的形式，而是从群众文艺、民间文艺中广泛吸取资源，使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新旧之间的“融通”。从文学语言角度来看，马烽的文字表现出“通而不俗”的特点。他的语言彻底地脱掉了“方言土语”或“欧化”的限制，形成了一种更为规范、流畅而又清新生动的现代汉语写作。他的多篇小说选入中小学课本，并非偶然。

我与马烽老师的交往

□杨占平

2022年6月18日，是马烽老师诞生100周年的日子。他于2004年1月31日逝世，至今已18年，然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让我崇敬、让我终身学习的代名家、长辈。

1987年初春，中宣部为了更好地制定文艺政策，派几位有影响的老文艺家到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马烽老师是其中之一，让我随行做记录。到了天津，马烽老师采取上门看望和分别交谈的方式，到孙犁、梁斌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家里拜访，虚心听取他们对文艺创作的看法；与袁静、鲁藜、柳溪、杨润身、马骥才、蒋子龙、航鹰等作家分别交谈，诚心诚意与他们交流思想，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跟一批青年作家座谈，主要是鼓励他们积极深入生活，创作出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来。离开天津前，马烽老师专门嘱咐我，一定要按规定付给接待方住宿费、伙食费和粮票。接着，从天津去了山东、河南，两省的作家大概已经从不同渠道知道了一些马烽老师在天津的诚意，基本上没有什么疑虑，调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紧接着，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开幕，马烽老师是代表，便直接向大会报到。会议期间，马烽老师跟我认真讨论了调查报告大纲，提出了他的思路和应当有的主要内容。我写出了初稿，他作了反复修改才定稿。这次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工作，马烽老师像朋友一样，跟我谈文学，谈社会，也谈他的生活和创作体会。

有了上次一起出行的经历，我对马烽老师不再有敬畏的心理，隔一段时间，就会借一些事情，去他家里坐一坐，聊聊天。特别是1989年底，中央调马烽老师到中国作协主持工作，临走还跟我说：“从个人角度考虑，我确实不想去北京，因为五十年代初，我就在中国作协工作过七年，知道在那里当领导不容易。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又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在北京的几年间，马烽老师尽职尽责，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辛勤工作，理顺了各方关系，让中国作协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而他却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条件。我去北京出差时曾经顺便看望过他，马烽老师跟夫人段杏锦老师就住在鲁迅文学院一间十分简陋的房间里。1994年，马烽老师回到山西休养，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回忆性散文，把几十年前就曾打好提纲并写出过部分章节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和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续写、修改完。我去马烽老师家里，总是看到他在工作。

1997年冬天，马烽老师住进医院。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他说：“有不少朋友劝我把这几十年写的东西编到一块，出部文集。北京的杨桂欣已经联系好大众文艺出版社，他们愿意出。可我年老体弱，编起来有些困难，想请你帮我编，你看行不行？”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在马烽老师和段杏锦老师的指导下，先列出所有作品的目录，然后跟他们具体研究收录的篇目。在几十年的创作中，马烽老师前后与西戎、孙谦合作写过不少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起初，马烽老师不想收入这些合作性作品，以免让读者产生将别人作品据为己有的嫌疑。我认为，这些小说和剧本都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如果文集不收人，就不能全面反映他的创作成就。为了说服马烽老师，我专门查了《著作权法》，并去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咨询。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和《实施条例》，如果属于不可分割的作品，合作者都有权使用，但须征得另外作者的同意并付稿酬。于是，我与当时还健在的西戎老师、与已逝世的孙谦老师的家属，分别作了沟通，征得了他们的同意。这样，他才同意收入这部分合作作品。2000年春天，8卷本、近300万字的《马烽文集》正式出版了。这部文集，是马烽老师半个多世纪文学创作的总结，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数据。

马烽老师的文集出版后，我们计划编辑出版一套《马烽研究丛书》。起初马老不同意：“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要浪费你们的精力了。”后来，他被我们说服了，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为了写好书，我们沿着马烽老师一生走过的路，重新走访了一遍。每次回来去向他讲述所见所闻时，他总是很有兴致地听，并询问熟悉的人和事，询问老区有什么变化。特别是2003年夏天，马烽老师用了一周的时间，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披露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按我们的写作进度，2004年上半年这套丛书就能够出版。想不到的是，马烽老师还没有看到书就走了。

我与尊敬的马烽老师交往十几年，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为文的宝贵经验。他那光明正大的品格，诚实待人的态度，从不贪图名利的原则，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跟随我的每次谈话，都是对我的谆谆教诲。